

英国人的厕上阅读

吴其尧

(或纸质或线上)。报纸上各种形式的文字游戏和猜谜活动对英国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英国人读完报纸也特别喜欢给报社编辑写信,内容包罗万象;编辑也都是有心人,会把读者来信编辑成书出版。比如,《第一只布谷鸟》《第二只布谷鸟》等书就是《泰晤士报》历年读者来信的汇编,据说还有第三只、第四只布谷鸟。关于“布谷鸟”系列的书籍,读者可以参考著名学者吕大年先生的文章《第二只布谷鸟》。吕先生的文章写得既有趣又有料,您读了肯定会获益匪浅的。

英国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阅读任何文字,阅读是英国人所有休闲娱乐活动中排在最前列的。在很多英国人的家里,厕所里整齐地摆放着大堆书籍和报刊,供如厕时阅读之用,他们称之为“厕上阅读”(Bogside Reading),Bogside这个词显然是“炉边”(Fireside)和“枕边”(Pillowside)的戏仿。福克斯认为,虽然“厕上阅读”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流行,但在英国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是英国人的积习。我们中国人中也有“厕上阅读”的习惯,但似乎并不普遍。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尤其是男性,如厕时不读点什么,如厕就会以失败告终。假如没有合适的厕上读物,他们会把厕所用品的说明书作为阅读材料。厕上读物主要是那些相对不那么严肃的书籍和杂志:幽默作品、名人名言录、书信集、日记、各种参考书、旧杂志等等,至于什么人读什么厕上读物则视不同阶层而定,这就又回到前面所说的英国人对阶层差异的注重了。

厕上阅读除了反映英国人热爱读书这一基本事实外,还可以作为英国社会阶层的指向标(class-indicator)。劳工阶层的厕上读物主要是幽默、娱乐或与体育运动有关的书报,比如笑话集、漫画、谜语以及各类体育杂志。还有一些关于兴趣爱好方面的书刊,比如关于垂钓、园艺、收藏、观鸟、散步、养宠物以及针织等的。相比之下,中下和中中层人士不是太热衷于厕上阅读,他们如厕时会阅读书籍或报刊,但他们觉得宣扬如厕时的阅读习惯并非雅事,甚至显得粗俗不堪,尤其是这些阶层的女性一般不愿承认自己如厕时有阅读的习惯。其实这是假正经。中上层人士倒是不至于这么故作正经,他们的厕所里通常设有一个小型图书室,如厕时可以随手取用。

有些中上层人士的厕上读物颇为高雅,不无炫耀的嫌疑,选择放在厕所图书室里的不是用来如厕阅读而是用来供客人欣赏的。比如,有人把企鹅丛书、平装本的《简·奥斯汀书信集》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之类的读物放在厕上书架上,甚至还有人在厕所里阅读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书。英国人给人的感觉比较拘谨、内敛、低调,但有时候他们也喜欢炫耀,只不过炫耀的方式比较巧妙而已。试举一例,还是与厕所有关。英国人通常会在家里展示家庭成员获得的各种奖状、奖章、荣誉证书以及照片(包括与名人合影的),展示的地方不是在容易惹人眼目的客厅或卧室,而是在通往厕所的走廊两边的墙壁上,英国人风趣地称之为“brag wall”(炫耀墙),我们中国人家里也有这面墙。试想,客人来家里喝下午茶,喝多了自然要如厕,如厕时自然可以看见这些值得炫耀的东西。如此这般,既显示了英国人的低调内敛又达到了炫耀夸示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上层社会的厕上阅读趣味反而更接近于劳工阶层,他们主要阅读关于体育运动的报刊和幽默类的书籍,所不同的是劳工阶层阅读的体育杂志通常是关于足球等球类运动的,而上层社会人士阅读的是关于狩猎、射击、垂钓之类的。有些上层社会人士的厕所里还放着一些有趣的童话书籍,当然都是经典童话故事。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第二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怎样读书》的结尾写道:“然而,又有谁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不论这个目标多么理想,而来读书的呢?难道就没有一些事我们纯粹出于欣赏喜爱而做的吗?难道就没有一些乐趣其本身就是目的吗?阅读不就是其中之一吗?至少,我有时候梦见在最后的审判日来临之际,那些伟大的征服者、律师和政治家前来接受他们的奖赏——皇冠、桂冠、或名垂青史的英名——的时候,万能的上帝看见我们腋下夹着书走过来,他会转过身来,以无不羡慕的口吻对彼得说:“等等,这些人不需要奖赏。我们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们。他们一生热爱读书。”喜欢厕上阅读的英国人正是热爱读书的。记得旅美学者庄信正先生说他“初读这段话时深受感动,几乎流泪”,而我则是每读一遍这段话都会被感动,直至落泪。

不难看出,英国人讲求阶层差异,同时也注重不同阶层语言文字的不同使用。著名影星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就认为:“英国是一个迷恋文字的民族”(a people obsessed by words)。很多英国人也认为英国文化是“言语”(verbal)而非“视觉”(visual)的文化,英国人爱好文字喜欢阅读。英国的出版业发达,平均每年要出版15万本左右的新书,人均读书量和人均拥有的报刊数量都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英国人特别喜欢阅读各类报纸,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每天都会阅读一份或几份报纸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最早知道冈山白桃这种水果,还是在蔡澜的《蔡澜食单·日本卷》里,他在书中提及桃子的品种,说:“最香最甜最多汁的要算白桃,而且是冈山出产的白桃,才是顶尖的级数。”蔡澜提到中国出产的桃子时,只说:“到了七八月,大陆各省都能见到桃子,又红又大,但是硬和酸的居多,应该小心挑选,才可找到又甜又多汁的。”(《蔡澜食单·桃》)

我从小生长在上海,每年都能吃到上海本地产的南汇水蜜桃,以及无锡阳山出产的水蜜桃。水蜜桃有浓郁甜美的香气,是我特别喜欢的水果,尤其是品质好的阳山水蜜桃,个头很大,单颗约重半斤以上,也有重达八两左右的,有时夏天的傍晚不想吃饭,吃一颗阳山水蜜桃就觉得饱。如同古代神话里可以疗饥的仙桃,大个的水蜜桃吃下去就有这样一种满足感。据水果店的售价来看,阳山水蜜桃比本地产的南汇水蜜桃要贵,是公认品质极佳的桃子。我很遗憾蔡澜的书里没有提到香甜多汁的阳山水蜜桃,同时心里也很好奇,所谓的冈山白桃到底是怎样的桃子。

2018年的时候我在京都,7月底的一个傍晚,和同宿舍楼的友人一起逛超市,准备买点食材做晚饭,在超市里见到有冈山白桃出售,两颗包装成盒,盒子上用大字体标明了产地冈山,大小、色泽和阳山水蜜桃非常相似。友人也注意到了,说了一句:“看,日本的桃子个头很大诶。”我说这不稀奇,无锡阳山的水蜜桃也有这么大的。但友人说她从没听说过阳山水蜜桃,当然也就没有吃过。友人是广东女生,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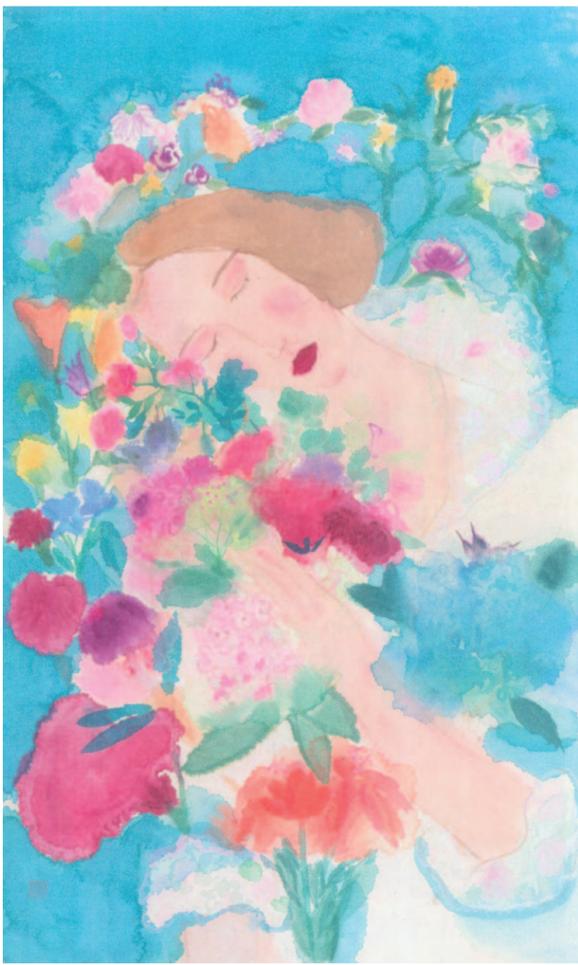
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上海,以为阳山水蜜桃、南汇水蜜桃是人尽皆知的果品,这时才意识到,可能出了长三角地区,乡邦特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未必如我向来以为的那么大。冈山白桃的售价很昂贵,当时我刚买了一整套《神田喜一郎全集》,月底已经没有什么余

钱,终究觉得太贵而没有舍得购买。

第二年在东京的时候,有一次逛超市,看到了货架上的冈山白桃,想起来又到了桃子上市的季节,居然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年。一时有些感怀,终于痛下决心买了两颗。回到住处后,打开包装就闻到浓郁的桃子香气。冈山白桃皮很薄,尖端微带浅粉色,玉色的果肉细腻柔滑,一口咬下去,能吮吸到丰沛的汁水。确实是很好吃的桃子,并且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香气,都和阳山水蜜桃几乎完全一样。蔡澜的书里称羡冈山白桃,认为是“顶尖的级数”。在我看来,阳山水蜜桃和冈山白桃一样都是顶尖的水蜜桃,品质不分轩轻,并且两者之间其实颇有渊源。

桃子原产我国,古代有鬼畏桃木的传说,可以用桃枝、桃符辟邪。日本古代引种桃树后,产生了桃太郎的民间故事,讲从桃子里诞生的桃太郎打败居住在鬼岛上的鬼。桃太郎所以能打败鬼,与鬼畏桃木的说法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明代晚期,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著录了水蜜桃:“水蜜桃,独上海有之,而顾尚宝西园者尤佳,其味亚于生荔枝。”顾尚宝西园即顾名世的露香园,是与豫园、日涉园并称的明代上海三大名园之一,今已不存,这是关于上海水蜜桃最早的记载。清人褚华著有《水蜜桃谱》,考述了水蜜桃的来历:



女孩儿(国画) 秦秀娟

水蜜桃之味

杨月英

水蜜桃,前明时出顾氏名世露香园中,以甘而多汁,故名水蜜。其种不知所自来,或云自燕,或云自汴……露香园自顾氏衰后为演火器所,俗谓之九亩地。园之水石犹有存者,而天氏纂纂实无一株矣。今桃之最佳者,产黄泥墙李氏吾园,次者产右营游击署北,与露香接壤,下者产西门城濠及诸处散种者。

上海水蜜桃的树种流传开来,以李筠嘉的吾园之中所种植者为最佳。王韬在《瀛壖杂志》中,对当时的上海水蜜桃作了细致的描述:

桃实为吴乡佳果,其名目不一,而尤以沪中水蜜桃为天下冠。相传系顾氏露香园遗种,花色较淡,实亦不甚大,皮薄浆甘,入口即化,无一点酸味。最佳者,每过一雷雨,辄有红晕。其树以秋分时钜枝接种,非老木也。五年后结实始美,惜易蠹蚀,七八年即萎。在城西一带者为真种,移植他处则味减。近年南门外数十里中皆种桃为业,一望霞明,如游武陵源里,顾其味则远不及。今远商所买者,皆南门外也。其种甚难得,且每逢垂熟,官票封园,胥吏从中渔利,高其价以售之民,一桃辄百钱,贫士老饕,颇难属焉。

钱泳《履园丛话》亦称:“吾园在上海城西,邑人李氏别业。得露香园水蜜桃种,植数百树,桃花开时,游人如蚁。”早在清代,上海水蜜桃已经名冠天下,售价高昂。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县志》,“光绪初年,浙江奉化从黄泥墙引种,自行繁殖推广,名为奉化玉露桃。本世纪20年代初,无锡引种化桃,名为红花水蜜桃。”可知国内著名水蜜桃品种,亦本于上海水蜜桃。

日本植物学家菊池秋雄写过一本谈中国北方果树园艺的书(东京养贤堂1944年出版,尚未有中译本),在桃的分类部分提及,水蜜桃属于桃子的华东系,品种群以江浙一带为中心,其特点为果肉柔软多汁,日本桃子品种群多属此类。华北系品种的桃子果肉更为坚实,在中国被称作脆果,以天津水蜜桃和肥城桃为代表。菊池秋雄曾任京都植物园园长、京都大学教授。1948年,他在《园艺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上海水蜜桃与白芒水蜜桃》,文中引证《舶来果树目录》,称日本的水蜜桃品种是在明治八年(1875)从上海引入日本的,并提及了英国的水蜜桃品种 Shanghai Peach于1844年从上海传入英国,1850年中国水蜜桃品种传入美国,名为 Chinese Cling,这里的cling指这一品种的桃子有果肉粘核的特点。

上海水蜜桃甘甜多汁,不仅在国

内是名产,到了日本后也流行开来。日本汉学家安井小太郎《多摩河观桃记》中详细叙述了水蜜桃传入日本后受欢迎的情形:

多摩河南岸地质轻松,宜种桃、梨,土民培以业者旧矣。然皆土种味劣,产额亦不多,二十年来,易以中国种所谓水蜜桃者也,实丰味美,其利倍于旧种,土民争植之,梨亦择善种而栽植。

安井小太郎(1858—1938),号朴堂,是江户时代著名汉学家安井息轩的外孙,曾任学习院教授,1902年至1908年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担任教习,回到日本后,又先后在第一高等学校、大东文化学院、二松学舍大学任教,在当时被称为日本汉学界的泰斗。多摩河即多摩川,有时也因为日语读音相同写作玉川,发源自山梨县,流经东京、神奈川县。《多摩河观桃记》中提及南岸适宜栽种桃、梨,至今多摩川梨仍是当地名产,但找不到如今当地特产桃子的记载,只留下20世纪初,《多摩川观桃记》中“桃树春初剪新条,是以高低齐一,枝干屈曲扶疏,紫萼若缀,灼灼放光……干高地寂,悠然觉非人境”的往昔风景。

夏目漱石的小说《三四郎》里,有着三四郎和广田先生在前往东京的火车上初遇时,广田先生从车窗探出脑袋买了水蜜桃,和三四郎边吃边聊天的情节。《三四郎》作于1908年,距离水蜜桃传入日本仅仅三十年左右,日本已经在冈山县培育出水蜜桃的新品种。胡昌炽于1931年发表《江浙桃种调查录》,提及苏州农业学校当时已栽培了田中、传十郎、土仓等日本的水蜜桃品种,另有一些欧美品种的水蜜桃,也经由日本试验场及学校输入我国。此后来自日本的水蜜桃新品种陆续传入我国,据《中国果树志·桃卷》,1899年日本冈山县的桃园中,以上海水蜜桃自然实生后代选育出了“冈山白”的水蜜桃品种,1934年引入我国。此外,“白凤”和“大久保”也是上世纪30年代从日本引入的水蜜桃品种,先种植于无锡杨湾,后逐渐成为我国桃子产区的重要主栽品种,同时也作为亲本植物,与国内本土水蜜桃品种一起参与新品种的选育。

要而言之,桃树是我国原产,在古代就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到了明代,上海出现了“甘而多汁”的新品种,被称作水蜜桃,是当时的上海名产。19世纪中后期,上海水蜜桃先后传入欧美、日本,日本培育出了冈山白桃、白凤、大久保等著名水蜜桃品种,又传入我国。在国产水蜜桃之中,公认无锡阳山水蜜桃和上海南汇水蜜桃品质最佳。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之中,水蜜桃的品种经过多次改良,成为夏季最为美味的果品之一。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认为水蜜桃之味“亚于生荔枝”,荔枝当然是很美味的水果,然而特别难以保鲜。水蜜桃虽然娇嫩,相比较荔枝总是更耐储存,这是很大的优点。成熟的桃子有非常甜美的香气,像是夏季傍晚的梦一样,带有甜蜜美好的氛围,这也是荔枝所不能比拟的。对于水果的偏好是很主观的判断,比如我就不赞同王象晋的评价,并且在心里很坚定地认为:“水蜜桃之味,优于生荔枝。”

张充和生于哪一年

陈蓓

在众多关于张家四姐妹的书籍著作中,对于张充和出生年份的记述略有差异。甚至有人颇感费解,为何作为四姐的张充和比大弟张宗和晚进大学。

其实对张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张宗和的求学之路是按部就班,自小学而中学到大学,1931年17岁入东吴大学,次年18岁转学,考入清华大学。而张充和在襁褓之中就过继给叔祖母,一直生活在合肥,直到16岁才回苏州。她并未如其他在苏州的姐妹进入新式学校就读,而是在合肥的家中接受教育,叔祖母请了最好的国学老师到府,单独教授张充和。

张充和16岁回到苏州家中,才在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就读,除了国文之外,不少科目都需要补习。她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随家人迁居上海暂住,初春考取务本女校,秋季转至光华实验中学。1933年暑假期间(8月15日),她和大弟张宗和一起自苏州搭火车到北京,参加三姐张兆

和与沈从文的婚礼,随后即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在次年1934年21岁时考入北大国文系。那时大弟张宗和已读清华大学历史系三年级了,此乃张充和晚大弟三年进大学的缘故。

北京大学的档案显示,张充和学籍资料的姓名为张璇,别号充和,籍贯为宁夏中卫,入学年龄为19岁,何以如此?原来是大弟张宗和和女朋友为张充和办了一张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的毕业证,张充和才得以以中学毕业生的资格报考北大,所以张充和的籍贯和年龄,应该是依据那张毕业证而来的。

张宗和是托谁为四姐办得这张甘肃的毕业证呢?张宗和的日记以及和四姐的通信,时常提及一位“老苏”苏景泉,此人为姐弟俩一辈子的的好友。就如张充和1961年2月15日致张宗和信中所言:“老苏仍然对张氏兄弟忠实如恒……老苏仍然是老苏……一如三十年前,怀古,吊今,叹气,怜恤,义气。”(《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虚岁实岁算法,有时不免会造成一些混乱,也是在情理之中。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张宗和日记(第一卷)1930—1936》193页,1932年5月17日张宗和写道:“今天是四姐二十岁生日,家里一点没有什么,只有我昨天写了一张片子,送了一个洋娃娃给四姐。”1932年5月17日恰逢阴历四月十二,民间说十九足岁那年的生日,阳历和阴历与诞生之日完全相同,1913年出生的张充和那年正是十九足岁,虚岁二十。

《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511页,1977年8月8日张充和给张宗和女儿的信件中写道:“你们爸爸一岁十二天。”张宗和的生日是1914年阴历四月二十四,与张充和的1913年阴历四月十二正好是相差“一岁十二天”。

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炜的《天涯晚笛》,兹节录第57页苏炜采访张充和的相关段落如下:

“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我顺口问。“一九一三年。就是民国二年。阴历是四月十二日,公历是五月十七日。现在很多书里提到我是一九一二年出生,是传错了。大概是当初结婚时候登记婚事的人,按中国岁数的算法,算多了一年,就这样讹传讹了。”

如果我们对张充和的出生日期还有什么不确定,多翻几本书比对一下,应当就能厘清真相了。